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美] 詹姆斯·A. 道 史迪夫·H. 汉科

[英] 阿兰·A. 瓦尔特斯 编著

黄祖辉 蒋文华 主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美] 詹姆斯·A. 道 史迪夫·H. 汉科

[英] 阿兰·A. 瓦尔特斯 编著

黄祖辉 蒋文华 主译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 (美)道, (美)汉科, (英)瓦尔特斯编著; 黄祖辉, 蒋文华主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 陈昕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ISBN 978-7-5432-2412-4

I. ①发… II. ①道… ②汉… ③瓦… ④黄…
⑤蒋… III. ①发展经济学—文集 IV. ①F06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4342 号

责任编辑 彭琳
装帧设计 王晓阳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美]詹姆斯·A.道 史迪夫·H.汉科

[英]阿兰·A.瓦尔特斯 编著

黄祖辉 蒋文华 主译

出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7.25

插页 3

字数 256,000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2412-4/F·767

定价: 45.00 元



主编的话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

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顾昕

2014年1月1日



译者的话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认为政府干预是欠发达国家摆脱贫困陷阱所必需的，“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发达国家取得经济、社会进步必需的、真正不可缺少的条件”(Paul A. Baran, 1957)。这种经济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源于1929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和30年代苏联所进行的相对成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另一方面源于凯恩斯革命所鼓吹的国家干预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投资决定论。人们关注“市场失灵”,却忽视了“政府失灵”所带来的危害。然而,许多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及相互对比表明,发展市场经济是一国经济持久繁荣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

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论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水平造成低的自愿储蓄率和积累率。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投资率很低,无法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力,经济运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要想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要么由政府进行强制储蓄和投资,要么争取到足够多的外援。

2. 虽然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并不适宜于发展中国家。一则是因为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现代化需要的时间太长,速度太慢,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

跳跃式的发展。二则是私有制所带来的收入不均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资源浪费”(集中体现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上),使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即使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现代化,仍不是一种“理想状态”,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做得更好。

3. 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对本国的“幼稚”工业(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是幼稚的)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但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持悲观态度,认为初级产品的出口不仅将面临需求增长呆滞的状况(收入弹性较小),而且这些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于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而言会下降。因此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

4. 在以上三点的基础上形成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政策。包括私人产权的公有化,大规模地创建国有企业,制定全面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投标计划,对私人经济进行广泛的控制或管制,歧视农民的价格政策和其他一些干预政策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发展经济学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乃至否定。其一,发展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看,带给人们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发展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源条件差、收入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弱,也不是人口太多、缺乏外援,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及其所依赖的制度安排在解决行为主体的激励机制问题上的失败,使得经济发展丧失了持久的动力。在这些国家,“偷懒”(hidden action)和“说谎”(hidden information)成了人们的理性选择。其二,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表明: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地利用了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帕累托有效配置的机制;自由价格制度不但起着传递信息和遏制损人利己行为的作用,而且起着诱导人们试验各种可能的经济组织结构以发现最高效率的分工结构的作用;政府失灵对经济发展的阻碍远甚于所谓的市场失灵,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制度缺陷所带来的巨大交易费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是一本1998年最新出版的论文集。虽然这里的许多文章若干年前就已发表(在编入本书时又都作了修改),但把它们汇集在一本书里,依然可以给读者强烈的震撼

与启迪。书中的众多作者(包括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在内)分别运用了这些年新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新增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经济学等,并借助大量的案例调查与分析,给读者揭示了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存在的缺陷及建立在传统发展经济学基础上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的失灵,明确提出发展市场经济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正确选择。这无疑是一场发展经济学的革命。

然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作为译者,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书中的全部观点,尤其是某些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仅仅依据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依据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的失灵就否定发展中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极其片面的。“市场经济是否只能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这一立论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将会对这一立论给予有力的回答。总之,无论是对于书中的理论阐述还是政策主张,我们希望读者作出全面、科学的分析,辨明片面或者错误之处,吸收借鉴合理、实用部分。

最后,我们要对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其所提供的本书中文版版权。本书的翻译是在黄祖辉、蒋文华主持下,通过陈欣欣、苏胜强、郭红东、许莹四位同志的共同参与合作完成的。许莹参与了“编者的话”和“绪论”的翻译,苏胜强参与了第1篇的翻译,蒋文华参与了第2篇的翻译,陈欣欣参与了第3篇的前两章(第12、13章)及第4篇的翻译,郭红东参与了第3篇后三章(第14、15、16章)的翻译。黄祖辉、蒋文华共同负责对整部译稿进行修改、统稿和校阅。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不妥之处,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1999年11月于杭州华家池



编者的话

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的瓦解戏剧性地展示了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的破产。然而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60 和 70 年代，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始终认为，要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所谓的贫困陷阱，政府干预是必要的。杰出的学者们指出了“市场的失灵”，但忽略了政府失灵的危险。

在正规的完全竞争模型下，许多发展“专家”们忽视了现实，忽略了产权和市场价格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恰当的经济推理被社会工程化和过于简单的模式所替代，这种模式强调了资本积累和外援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并没有把对资本有效利用和动态贸易收益至关重要的制度体系考虑进去。甚至没有多少专家认识到由外援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或者说官方援助所产生的公共选择后果。

计划经济的失灵以及外援对经济增长几乎不起作用，甚至可能是障碍，这一共识引发了发展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今天，发展计划的作用正在削弱，而市场作为创造长期繁荣机制的作用则在不断体现。

本书阐述了传统发展理论的缺陷，并将这种理论与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度、激励和信息这些决定经济绩效的新发展经济学作了比较。本书谨献给彼特·鲍

尔,他长期坚持的关于发展计划无效和外援有害的观点已被事实所证明。许多章节反映了他早期的见解,许多作者继续他的个案研究方法,以取得有关促进和阻碍经济增长因素的第一手资料。

许多年来,鲍尔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流浪汉。他的不同观点无人响应。然而今天,鲍尔和其他市场自由主义者不再被遗弃,他们的思想正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发展经济学确实已发生了一场革命——甚至世界银行也加入从计划到市场的行列中,并重新检验政府的作用。世界银行1996年的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没有包含发展经济学家们所热衷的传统增长理论,报告的立足点落到了市场这边。过去一些年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市场化的研究也证明了鲍尔的洞察力,显示了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严谨的经济推理、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关注,以及明快的写作,总是鲍尔著作的特点。在为本书选择文章时,我们也力图坚持这些标准,其中许多文章在运用价格理论和依赖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特点明显。实践表明,在发展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中,简单的模型并不起作用。这就是本书的撰稿者采用学科交叉的思路来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仍然贫困的原因。

文化、道德、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是复杂和令人着迷的。本书的目标是阐明这种复杂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更容易地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也反映了鲍尔对全世界贫困人口尊严、理性和才能的极度关注,这和观点“极度一致”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态度迥然不同。

以下是我们的致谢。首先,我们要感谢伊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大卫·肯尼迪(David B. Kennedy)自始至终的鼓励。其次,要感谢所有为本书撰稿的作者和科特·斯库勒(Kurt Schuler)在本书出版时的帮助。我们也要向埃德·克莱恩(Ed Crane)和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对该项活动的支持以及对为纪念彼特·鲍尔而召开的、进而产生了本书许多文章的学术研讨会的赞助表示谢意。最后,詹姆斯·道(James Dorn)真诚地感谢来自陶森大学(Towson University)学术研究委员会的资助。

目 录

主编的话
译者的话
编者的话

CONTENTS

1 绪论:对不同发展政策的透视 詹姆斯·A.道 1
第1篇 关于发展经济学的争执
2 对现实的忽视 彼特·鲍尔 21
3 国家的贫困 卡尔·布鲁纳 34
4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 ——从计划到市场 狄帕克·拉尔 45
5 人口增长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吗? 朱利安·L.西蒙 63
第2篇 制度选择和经济发展
6 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 道格拉斯·C.诺思 79
7 经济增长与产权制度 阿兰·鲁福斯·华特斯 89
8 制度选择和公共选择 查尔斯·K.罗莱 105

<p>9 部落所有制:土著美国人经济发展的祸害</p> <p>史迪夫·H.汉科 巴涅·道德勒 117</p>	<p>第4篇 经济自由主义、贸易和增长</p>
<p>10 产权和萨赫尔的经济发展</p> <p>韦纳·T.布洛夫 莫温奇·S.基曼伊 129</p>	<p>17 自给自足、贸易和交换:理解发展中的经济</p> <p>彼特·鲍尔 221</p>
<p>11 非洲本地的制度和经济发展</p> <p>埃米莉·查姆丽-莱特 144</p>	<p>18 经济发展和经济自由</p> <p>布莱安·约翰逊 托马斯·谢 232</p>
<p>第3篇 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的失灵</p>	<p>19 经济不平等和对社会公正的寻求</p> <p>卡尔·布鲁纳 240</p>
<p>12 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不良经济影响</p> <p>都格·班道 165</p>	<p>20 税收、经济增长和自由</p> <p>艾尔文·拉布什卡 246</p>
<p>13 抛弃失败政策</p> <p>保尔·克莱格·罗伯兹 182</p>	
<p>14 西方援助与东欧改革</p> <p>彼特·鲍尔 190</p>	
<p>15 移动平均数定价的危害</p> <p>阿兰·A.瓦尔特斯 200</p>	
<p>16 国家和农民:试验中的农业政策</p> <p>约翰·P.鲍威尔逊 208</p>	

1

绪论：对不同发展政策的透视

詹姆斯·A.道*

经济成就的取得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能力和态度，也取决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些决定性因素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进步速度的快慢。

——彼特·鲍尔：《关于发展的异议》

全面计划和自由市场

中央集权计划的梦幻随着 1989 年的东欧剧变和两年后的苏联解体而告终。但早在 1989 年的市场化改革以前，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的失灵就已经显现。路德维格·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奇·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彼特·鲍尔(Peter Bauer)等经济学家已认识到，若没有价格和利润的导向，没有受法治明确保护的产权制度，要试图直接管

* 詹姆斯·A.道(James A. Dorn)是加图研究所负责学术事务的副主席、陶森大学(Tow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

理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存在内在的矛盾。

苏联中央计划模式的最初成功使发展经济学家误认为,自上而下的经济组织系统可以纠正“市场的失灵”,投入产出模型可以代替完全竞争的价格体系来配置稀缺资源。传统理论认为,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中的自由个体运作相比,计划者能够更好地利用已有的信息,获得更大的经济进步。

许多事例足以说明,在战后初期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的全盛时期,人们对中央计划充满了信任。1957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尔·巴兰(Paul A. Baran)写道:“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发达国家取得经济、社会进步必需的、真正不可缺少的条件。”(Baran, 1957, p. 261)在此一年前,古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曾写道:“在长时间的困惑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顾问们……推荐将中央计划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Myrdal, 1956, p. 201)

计划的精神包涵了社会的工程化:其目标不仅仅是控制经济,而且要控制人和再造社会。正如鲍尔(1976, p. 188)指出的,缪尔达尔的主题是“为了达到更高的,至少是可申报的人均收入,个人行为和社会态度需要重新调整”。发展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优秀的顾问和技术专家提出好的政策建议,然后由优秀的政府去实施,以实现社会的利益。”(World Bank, 1997, p. 1)^①

计划的精神和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极其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多年的失灵后,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仍认为:

当发展计划所需的大量信息的收集、调整、分类和分析在全国范围出了问题时,解决的办法或许在于改进资料收集和工具,而不在于放弃计划本身。^②

在哈耶克看来,传统的社会主义梦想呈现的是“致命的自负”(Hayek, 1988)。逻辑和历史证明,完全计划的构想者,与那些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以及把个人和自由置于国家和强制之上的市场自由主义者相比,要缺乏远见。^③甚至于世界银行(1997, pp. 1—2)也承认,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其收益:“政府从事的是富于幻想的活动。由于对公共政策和领导者的坚定不移缺乏信心,私人投资者踌躇不前。腐败变成通病,发展蹒跚而行,人们忍受着贫穷。”

本书的中心是对发展政策的两个对立性观点,即信赖国家的观点和崇尚

自由市场的观点进行透视。”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市场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着计划向市场的转轨。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创建一个自发的市场秩序。出于需要，发展经济学的重点必须转向有关制度和激励以及后冷战时期的政府作用问题。

对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的研究，现在并不是着眼于实物资本和外国援助方面，而是着眼于人力资本和市场化。已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模式，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因此，在确定一个国家经济是繁荣还是停滞时，需要考虑产权、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因素。

彼特·鲍尔的研究体现了发展经济学重点的转换。他的开创性研究，包括对马来半岛橡胶工业和西非贸易的研究，使他对许多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观点提出了疑问，并最终推翻了传统的结论。

- 他驳斥了贫困是自我永存的观点，认为中央计划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

- 他证明了外国援助、移民和人口的限制政策以及贸易壁垒不利于经济的进步。

- 他对从简单经济增长模型出发滥用数学公式予以警告，并批评了经济增长阶段模型中所体现的历史决定主义。

- 他强调对基本经济原则以及制度、文化和历史的了解，这对于理解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作用。^④

近期许多包括制度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增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法经济学的学者的研究，证实了鲍尔的观点，即置身于明确的财产制度和有限政府行为中的市场，与作为一种为了迎合计划者的偏好和收入再分配而设计的命令控制系统相比，更易于产生财富。

正如鲍尔写道(Bauer, 1976, p.84)，中央计划破坏了文明社会和经济活力是因为：

它强化了许多不发达国家服从政府权力的传统，而这抑制了人们与生俱来的促使物质进步的才能和动机的发展。通过对人们生活持续和不断扩大的控制，中央计划加强了个人对权威的顺从。这样的发展阻碍了自力更生、个人奋斗以及持续的求知欲和在实践基础上的观念转变。市场化改革粉碎了苏联的幻想，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需要时间。新制

度和新思维的采纳,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本书的文章将有助于为改革和在新的发展经济学中进一步确立鲍尔的研究精神打下基础。第1篇是不同发展经济学观点的详尽讨论;第2篇分析产权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第3篇反思国家主导型发展政策的失灵;第4篇讨论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发展经济学的争执

1969年鲍尔在写著名的文章《关于发展的异议》时,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要使不发达国家从贫困中摆脱出来,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是“理所当然”的(Bauer, 1976, p.69)。在本书第2章中,他重申了他较早文章的论点,并指出,战后大多数发展经济学文献的特征是“对现实的忽视”。发展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偏见和对计划的偏好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从他们对传统增长模型的滥用和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忽视中看出。鲍尔认为,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基本的经济规律和大量的事实,发展经济学事实上倒退了。

鲍尔指出,“贫困的恶性循环”,即贫穷国家不能形成足够使它们摆脱贫穷的储蓄和投资,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谬误。但正如鲍尔发现的,现实中许多个人和国家已经脱离了反映人类生存状况的初始贫穷:个人通过努力工作、节俭、深谋远虑,取得了更高的收入,通过允许个人贸易自由化和在法治的条件下追求幸福,国家已经变得富裕。鲍尔也对主流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第三世界的贫困在于与西方国家进行商业贸易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这种观点忽略了比较利益原理和自愿交换具有互利性的事实。正如鲍尔注意到的,和西方国家贸易最少的那些欠发达国家(LDCs),也正过着最低标准的生活。

鲍尔认为,经济学的数学化会导致对难以量化的重要非经济变量的忽略,在研究国家怎样致富以及发展的进程时,这种尝试已经导致了对历史和时间维量的忽略。文化因素、个人信仰和抱负与产权一样尽管难以量化,但它们在物质进步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经济学家们忽略了探寻领域的基本差异。结果,主流发

展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脱离现实的。

国际组织和世界论坛领导人以公平或“社会公正”的名义呼吁将财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第三世界进行再分配，显然也忽略了现实。按照鲍尔的说法，财富取决于生产力，强制性的再分配会削弱生产的积极性，也与真正的慈善精神不吻合，这种发展必然会削弱良好的制度和人类的品质，而这种良好的制度和人类品质恰恰有助于减少世界贫困和刺激经济增长。

最后，鲍尔对发展经济学家们“滥用语言”作了批评，某些名词的运用，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不如说是政治的发明。鲍尔认为，运用普通语言描述现实是道义上的要求，没有语言的正确应用，世界将面临一个新的野蛮时期——它会忽视西方的道德传统和社会进步所需的约束。

在第3章，卡尔·布鲁纳(Karl Brunner)检验了国家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与鲍尔一样，他认为，“国家生产财富”或“没有国家具体的控制性干预，几乎不能创造财富”是个神话。布鲁纳认为，一个最小规模的或保护性的政府与一个再分配性的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前者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被严格限制，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执行保障个人和财产的法律，为自由设置组织机构，因而，竞争性市场能平稳地运作并创造财富。在后者的情况下，由于对“社会公正”的追求缺乏统一的定义，政府的作用未被限制——当抢劫变成合法时，无人会安全。布鲁纳分析的政策含义是，越接近前者的国家，就越会有自由和财富；越接近后者的国家，就越会有强制和贫穷。

狄帕克·拉尔(Deepak Lal)把前计划经济国家出现的转变描述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第4章中，他讨论了导致1989年市场化改革的事件和战后发展经济学领域学术气候的转变。在这点上，他对鲍尔的开拓性研究作了拓展。尽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经济计划和经济独立是发展经济学家思想的特点，但今天，一致性的意见是支持全球化、产权明晰化和市场化。

和鲍尔一样，拉尔不赞成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发展理论，因为存在太多复杂因素，这些非经济变量不能包含在简单的增长模型中，但实际上，这些因素，如政治体制、地区特点和文化应该被考虑进去。拉尔区分了以规则认同为基础的“公民联盟”政府和以国家强制权力为基础的“企业联盟”政府。拉尔写道：“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建立起保证自由交换与公平竞争的公正法